

WANG JIA LIANG
XUE SHU WEN JI

12

王嘉良学术文集

综论·序跋

上海文艺出版社

WANG JIA LIANG
XUE SHU WEN JI

12

王嘉良学术文集

综论·序跋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12卷, 综论·序跋/王嘉良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21-4250-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嘉良-文集 ②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③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733号

王嘉良学术文集 第12卷

综论·序跋

王嘉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金华市三彩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36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5321-4250-7/I·3284

定价: 386.00(元)(共12卷)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79-82676863

目 录

文学与政治联姻:现实主义的独特张力与限制	1
略谈毛泽东《论鲁迅》的历史文献价值	19
鲁迅与郁达夫友谊成因探索	
——兼论鲁迅的交友之道	26
略论鲁迅对浙东乡贤文化的发掘与弘扬	38
论鲁迅的杂文艺术观	47
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与茅盾创作模式的建构	60
五四精神与“茅盾传统”	95
论茅盾创作的现实主义范型特色及当代意义	107
简论作为当代作家的赵树理	121
论赵树理尊重民族欣赏习惯理论的价值	133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为纪念柔石百年诞辰作	146
诗性智慧与艺术想象	154
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	163
“预计到读者也有智慧”	
——鲁迅小说艺术札记	171

重视读者的想象力	177
茅盾小说艺术谈片(三篇)	181
从把握“全面”中深入“一角”	
——茅盾创作经验谈	194
取精用宏 小题大做	
——茅盾创作经验谈	200
微型小说语言艺术谈片(三篇)	204
小说和寓言的联姻——寓言体小说	219
融文学涵养于艺术创作	
——读王义森的山水画	225
展示一个活的鲁迅形象	233
现实主义:值得深长思索的历史命题	
——读史瑶的《论茅盾的小说艺术》	236
喜闻野史有余篇	
——读萧乾主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243
拓宽儿童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246
尽力摆脱理论的贫困	
——读《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	251
体例新颖 自成特色	
——评舒金昌主编的《大学国文》	254
推动语文素质教育的可喜读物	
——评《中学生读写活页》	260
在强化学术性中提升刊物品位	261
对教育部委托编写高师的现代文学教学大纲的几点意见 ...	267

鲁迅作品教学漫谈	278
如何理解和讲述鲁迅作品中的难点	285
呼唤文学回归语文	
——语文分科教学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293
《浙江跨世纪文丛·理论卷》总序	299
《论中国新文学“浙江潮”》自序	303
“两浙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总序	308
辉煌“浙军”集结的文学史意义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整体透视》引论	319
《微型小说创作技巧》绪论	325
《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后记	341
《浙江 20 世纪文学史》修订后记	345
《世纪回望》后记	349
《新编文史地辞典》前言	351
《鲁迅传论》序	353
《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序	358
《茅盾写作艺术论》序	367
《赵树理小说新论》序	374
《沈从文小说论》序	380
《王鲁彦评传》序	384
《许钦文传论》序	390
《现代散文语体风格论》序	396
《乡贤教育读本》序	402
我两度叩开小楼的门	405

文学与政治联姻： 现实主义的独特张力与限制*

政治介入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一个突出表征。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新文学创作直面的是现实社会革命,许多作家本身就同政治有着割不断的情缘,其创作总是同反映社会问题包括政治制度变革紧密相关,势必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性。诚如李欧梵所指出的,从中国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出发可以概括出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社会—政治批判”^①。然而,文学与政治联姻,毕竟呈现着复杂状况,它注定将不停地被后人以各种方式言说;在现实主义命题范围内,因政治的强化也历来成为人们垢病现实主义文学的理由。我以为对其作简单化处理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重要的是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这一突出表征和重要形态,作出准确、科学的评价。



现实主义本身作为一种被接受、被阐释的文学思潮,在不同

* 本为原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2期摘要转载。

① [美]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229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的接受者和阐释者那里有着认同和诠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对现实主义有如许多的“限制”,产生出诸如启蒙现实主义、人道现实主义、社会批判现实主义、心理体验现实主义等多种形态。^①在诸多现实主义形态中,恐怕没有哪一种像具有较强政治功利性的现实主义那样遭受过这么多的非议以至于攻讦。公允地说,此种类型的现实主义文学能作为经典文本传留于世的确实不多,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文学与政治是毫无关系的,文学与现实主义联姻是不可思议的;相反,文学无法远离政治,无法拒绝政治的渗透。鲍海姆有言,“艺术、文化和哲学由于是由当时社会和政治力量所塑造的,所以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主要乌托邦思想的表达”^②。社会政治力量“塑造”文学和文学成为特定时代乌托邦思想表达者,这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会得到更显著的呈示。“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弃和厌恶。在现实主义中,存在着一种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这种矛盾无法从逻辑上加以解决,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③韦勒克在这里就谈到了现实主义的先天命运——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冲突。他显然是排斥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正是现实主义自身特有的一种张力。而“规范”和“训谕”往往和政治性紧密相关,尤其是在不排斥教化(“训谕”)功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一旦使教化成为一种带有鲜明政治倾向性的教化,就会形成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政治性阐释,于是就有可能产生带有思潮性的文学现象,“政治化”现实主义文学便是如此形成的。

① 这些现实主义形态,笔者曾著文阐述,分别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5期转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

② [德]卡尔·鲍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2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③ 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32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政治思潮的影响力始终不能低估,而在特定时期还表现出强力显现的态势。这同这个时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以至于国际大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是现实主义文学依旧得到发展的时期,政治对文学的渗透也依旧彰显,尤其是“政治化”思潮特别浓重的“红色的30年代”。这显然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精神双重危机压迫下形成的,于是就有所谓“政治朝圣”的热潮。“所谓政治朝圣,主要发生于三十和六十年代,是西方文明或是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或是面临深刻的精神和价值危机的时代,西方知识分子因而转向其他社会寻找替代”,而社会主义体制“赋予了世俗生活以神圣的意义,使得全体人民具有了同一感和目的意识,整个社会因而凝聚成了某种共同体”^①。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何以认同“红色的苏联”一度形成一股潮流,许多作家也因此而纷纷“左倾”;同时也可以理解一大批中国作家走向左翼,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和声势最壮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文学的政治化和阶级性的强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鲁迅在30年代“由个性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化(瞿秋白语),重视了文学的阶级性、政治性要求,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是最典型的例证。

然而,从深层次考量,中国新文学作家对政治的认同,还不仅是个别作家的行为,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普泛性;他们在创作方法上选择现实主义,在文化观念上选择政治倾向性,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学意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②由此看来,此种

① 程映红:《政治朝圣的背后》,《读书》1998年第9期。

② [美]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形态的现实主义成因,从更普泛意义上看,还关联着本民族的政治文化生态及作家的创作心态。

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选择,就联系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用文学“革新”社会,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情结”。新文学产生前夜,现实主义就已受到青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备受关注。梁启超鼓吹“小说界革命”,欲以改良国民和社会,率先引进西洋“写实派”小说,便是基于其姿态鲜明的“小说救国论”(“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这种对文学政治功利性的极力推崇,就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重要创作机制。五四新文学诞生,为中国全面接受现实主义提供了必备条件,而对现实主义功能的理解,则明显向着服从于政治性、群体性、阶级性一面急剧倾斜。整个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处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于深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中国人民(尤其是身处“底层”的劳动者)来说,政治生活远较其他社会生活(包括个人精神生活)更受关注。没有阶级和民族的解放,遑论个性解放? 以此之故,中国新文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总是呈现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态势。而当30年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危机更趋尖锐化之机,强化文学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更是顺理成章。这里说的是左翼文学,其实右翼文学亦然,而且作为一种反证,恰恰证明了强化文学的政治化色彩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30年代初国民党文人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也是一种政治文学。司马长风认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无非把文艺当做政治斗争的手段,与左派的区别只在‘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名词不同”^①。此说虽过于笼统,但就政治介入文学而论,也有一定道理。张道藩就认为“文艺为生活意识的表现”,要求作家“用现实的形式”、“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目的在辅佐革命”^②。其提出文学以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第20页,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

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民族立场”、“辅佐革命”等,实质是以民族代言人、“革命者”的资格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发言,同样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要求文学与政治联姻的意愿也一样十分鲜明。只不过其所主张的政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而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在当时就没有市场。

从作家主体一面说,政治文化生态中形成的作家创作心态,注定了政治与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无穷的缠绕。政治化诉求是现代知识分子寻求重建文化秩序和精神支柱的自觉行为。“士志于道”、“明道救世”是中国知识分子素来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则将其转换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新主题,而且新文学处在一个社会危机频频的话语场中,社会历史处境将最终决定作家忧民患世的创作心态。五四以来的文化精英,无论是与文学发生若即若离关系的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还是典型的新文学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敏感性,他们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其创作心态的变化对整个新文学都会施加深层的影响。他们中有许多都有过“文学与政治的交错”(茅盾语)的经历,在革命高扬年代投身政治,革命受挫以后又专注于文学,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周旋恰恰展示了相当多作家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中“形成的态度类型”。鲁迅对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有过非常精辟的分析:“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①。对此,美国学者安敏成一语道破:“中国的两种革命——政治的与文学的——在历史中都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向”;“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②实际的情

①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② [美]安敏成著、姜涛译:《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况正是这样:对于许多作家而言,政治与文学的价值是等量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带给他们的,只是身份与角色的转换,而他们与革命、政治意识则始终“相伴相随”,这就注定了政治理念在他们的文学观中始终也是不离不弃的。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便注定关注政治不会仅仅只是少数作家的行为,还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普遍心态,不谈政治的文艺思想反而有可能被认为是落伍的思想。如抗战时期朱光潜提倡文学创作中的“心理距离说”,当即就受到巴金的质问:“我不知道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朱先生要把中国青年引到什么样的象牙塔里去。”^①像巴金这样政治化理念并不很强的作家尚且如此,政治观念强烈的作家就更不论了,政治文化对作家创作心理、创作思想的制约力莫此为甚。

二

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政治对文学的渗透带有普遍性,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化”现实主义,指的是明确标举文学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对社会现象作出旗帜鲜明的“政治阐释”,政治化程度甚深的文学类型。依据不同的政治内涵,中国新文学中的“政治化”现实主义可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态:“阶级政治”阐释与“民族政治”阐释。

“阶级政治”阐释是“政治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基本形态,其形成直接根因于中国20世纪前半期激烈的阶级对抗现实。20年代前半期,社会的阶级对立状况甚为分明,新文学作家已经提出了文学的阶级性命题。至20年代末,两大阶级的生死对抗激烈展开,遂有声势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文学的阶级性被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强化了文学的阶级性,毛泽

① 巴金:《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中流》第2卷第3期。

东在“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则把文学的“阶级政治”阐释作了更明确的规范。由是，就政治化程度而言，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当是最典型的“阶级政治”文学。这是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无可回避的现象：“阶级”取代“个人”成为文学注目的焦点，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愈来愈成为时代主题，大多数作家身不由己被卷入风云突变的时代漩涡中，有许多则在动乱中颠沛流离，深化了他们对民族和阶级苦难的认知；于是，融汇在阶级解放的洪流里，作家们以严肃、敏锐的现实视角和强烈、凝重的社会批判理性，集中关注现存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弊病，决然否定其合理性，激励人们为建立光明合理的新社会奋起抗争，就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主潮。

阶级文学主潮的形成，“阶级政治”一度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中心，无疑取决于它与时代思潮的契合。它曾一度盛行，与其说是它的理论完备性，毋宁说是它的适时性。“阶级政治”观因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使文学承受了过多非文学的因素，曾遭致许多强调“艺术独立”作家的责难。但问题的独特性恰恰就在这里：在30年代，“阶级政治”观念正是不断承受来自各种理论的挑战而日渐强固起来，而且每次论战都是以其取得更大优势而告结束。这只要审视围绕阶级文学观的几次重要论战便可见端倪。例如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五四作家的论战。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提出了超越五四文化秩序的命题，认为“五四”作家已经“落伍”，“阿Q时代”已经“死去”，现在是到了表现“阶级意欲”的时代了。这未必是精当之论，他们提倡阶级文学观，也没有将“阶级论”说清楚，然而论争的结果却是“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①，连鲁迅本人也被“挤”进了阶级论者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的队伍。原因无他,盖在于特殊的时代政治环境促使了文学功能认识的转化,“阶级论”似乎已有了“无可置辩”的正确性。又如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论争。新月派作家基于其文学独立、自由的立场,当然不能容忍阶级政治论,于是当左翼作家揭出文学阶级论的旗帜时便首先发难予以阻遏。今天看来,梁实秋主张文学可以表现“普遍的人性”并非没有道理,左翼作家只讲阶级性不准讲人性的观点倒反见出文学观念的偏狭,但在当时阶级观念几乎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时,梁实秋以颇为激进的全盘否定阶级性的姿态参与论争,便注定必处于下风,最后获胜显然在左翼作家一边。“这场论战在当时的直接作用,是扩大了阶级论的影响,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①。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阶级政治”阐释总是显得所向披靡、“无懈可击”,当时并非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左翼作家却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文学“话语权”,这恰恰证明此种观念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环境中还是颇有生存土壤的,它也的确存在着诸多适应新文学发展潮流的合理性因素。在阶级对抗最激烈的年代里,文学的阶级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鼓吹与阶级政治无关的“纯文学”观就会显得特别背时。左翼作家的政治敏感,实际上是对一种时代情绪的把握。时代情绪的表现也源自作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持守,库尔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家来再现。我的意思是说,只能由活在这个时代里的艺术家来再现它。”^②对左翼作家适应时代性的努力也应作如是观。

“阶级政治”文学文本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烙印着时代特质,呈现出复杂的价值取向。它们是在阶级对抗最激烈的年代产生,作家们带着强烈的革命义愤从事创作,其文本意蕴显示出作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现世使命的承诺,理所当然会与特定的时代精神相呼应。30年代的时代语境是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扬,

① 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② 《给学生的公开信》,《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

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失望一变而为改革旧制度的共同心理期待,因而关注社会变革的风气特别浓厚。作家们(特别是左翼作家)的现实关怀途径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社会”^①,他们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反映强烈的政治制度变革要求,实际上是以民众参与意识显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作品集中批判战乱频仍、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的社会现实真相,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心理共鸣。“革命文学”作家在文学领域里首先举起反抗的旗帜,就颇激动了一部分前进青年,所以尽管蒋光赤等作家的小说在艺术上较为粗糙,但仍是青年读者中流传最广的读物。早期“普罗文学”反映了“阶级政治”文学在其初始阶段的特点。作为表现革命性阶级性主题的首创者,其对时代思潮的敏锐感知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同样由于其是“首创”,阶级文学的创制毕竟前无先例,文学创作如何把握阶级性和文学性的关系,欠缺可资借鉴的经验,就不可避免显出种种艺术弱质。而且,“阶级政治”文学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同“纯文学”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也应对其作出有所区别的艺术价值考量。鲁迅为叶紫的《丰收》作序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也称不上是“永久”的艺术,它写出的都是一些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由此也就确立了其价值:“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②这既是对叶紫作品的切中肯綮的评价,也可说是对这一种类型“阶级政治”文学基本特质的精当概括。

三

如果说,“阶级政治”阐释具有一定的阶级限定性,那么“民族

①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3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政治”阐释以其“民族”视野的拓展就有着较大的普泛性与包容性。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的呈示,决定着“民族政治”话语的不可或缺,中国新文学的“社会—政治批判”也不会限于单一的“阶级政治”话语。事实上,新文学作家在“走向现实”与“政治批判”聚合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想,这为他们用文学变革社会提供了一个共有的“阿基米德点”——用“民族”视角观照社会批判社会,于是由“政治批判”演绎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平民意识伸展了现实主义的张力,它可以体现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阶级立场的作家身上,避免了政治批判仅止于单纯的“意识形态纠缠”,从而大大深化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内涵。

20 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倍受蹂躏的语词。“四万万万人同一哭,天涯何处是神州”^①,正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苦难民族命运的写照。在这一片土壤上诞生的中国新文学,也不得不承受着种种外在的压力,面对着一种种血与泪的经验和体认,在诸如“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八”、“七七”等这样一些刻印着民族耻辱与民族奋起的语符中备受苦难与艰辛。即使在今天的历史叙述中,我们依然能从过去频繁使用的“瓜分”、“丧权辱国”、“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等语词中感受到那一时代的紧张和压力。当生活安定的我们指责 20 世纪前期阐释“民族政治”的文学束缚太多,竟至于把抗战文学称之为中国新文学的“凋零期”,作家们“将抗日宣传与文学创作混为一谈,使文学创作一度陷入窒息状态”^②,恰恰暴露了我们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民族记忆的缺失,以致于无法理解那种时代给予的切肤之痛。正如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对轻视第三世界文学的指责:“如果规范的目标在于限制我们的审美同情心,通过阅读一小部分有选择

^① 《谭嗣同全集》上册第 167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②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 1、2 页,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版。

性的本文而发展我们丰富微妙的感性知识,不鼓励我们阅读其它任何本文或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那么,这便是人文的贫困。”^①今天对“民族政治”文学的排斥和狭隘理解也应该接受这种批评。

中国新文学同“民族政治”联姻贯穿在其发展全程中。新文学也是“民族的文学”,这是“五四”以来作家们的共识;“救亡”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条主线,就其特指意义言,所指恰恰是拯救民族危亡的民族性命题。但从“民族政治”的强烈显现而论,它应集中反映在以战争为契机的民族危急关头。“民族情怀”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下会加倍张扬,原由就在于民族感情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种强劲的凝聚力,因此民族政治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可以成为最重要的政治。例如“五卅”,李欧梵认为,“‘五卅惨案’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神经的影响,是巨大的”^②。五月的鲜血唤醒了潜伏的民族意识,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这只要看一看当时的《文学周报》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反映,当时名重一时的作家几乎都著文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便可见民族政治热情对作家的感召力。此后的“九·一八”(1931年)事变和“一·二八”事变(1932年),作家的政治热情又超越了“五卅”,抗战文学作品数量的激增,正与民族危机的加深同步,昭示着民族大义对于中国作家的更强烈感召。1937年抗战爆发后,“民族政治”无疑成为最大的政治,文学纳入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原来疏离政治的作家也卷入了战争的洪流,从而使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达成了文学使命的共识。“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③,这是当时“文协”确定的宗旨,也就是除汉奸文人以外所有中国作家对民族使命的共同承担,且将其贯穿在抗战始终。因而,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民族政治”对文学的介入,“抗战文学”无疑是一次最集中的显现。

① 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②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第249页。

③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文艺月刊·战时特刊》1938年第9期。